

general education, liberal study, 素质教育、通识教育、博雅教育……不论如何称呼,提到这些词语,没有一个高等教育领域的人在今天会忽视它,甚至许多大学看来,这是人才培养的基石,是过去被忽视埋没的珍宝。

近些年来,随着“双一流”建设的进一步深化,高校对于人才培养也有了新的体悟,新的专业在兴起,新的时代问题也在不断产生,对此,人们发现仅靠一门专业知识已经难以解决。学科交叉融合的需求迫在眉睫,通识教育也在一步步被推向新的高度。

通识教育究竟源起何时,又经历了哪些波折,未来的通识教育将何去何从?在由北京理工大学主办的2019两岸高等教育(北京)高峰论坛上,两岸百所高校校长、专家和学者给出了他们对于通识教育前世今生的解析,为当前两岸高校发展指明了方向。

从拆解到融合

追溯至古希腊时期,教育并不存在所谓专业、通识之分,那是一个圆融的时代。

“不论是在西方,还是我国老子的教育印象中,大学教育原本就是通识教育。”在中原大学教育研究所荣誉退休教授黄坤锦的眼中,自工业革命始,因为社会需求,大学开始走上了注重专业教育的道路,而通识教育也在不断的精细化拆分中被渐渐遗忘。

斗转星移,随着社会飞速发展,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本末倒置终于显露出了它的弊端。专业化的学习让人“走得宽,却不一定走得远”,知识的深度和广度受到限制。

1828年,惊雷炸响,万物复苏,课程改革冲击着每一所高校。耶鲁大学则在“刺激”中发布了一份《耶鲁报告》,试图将通识教育移回大众眼前。

《耶鲁报告》肯定了以古典学科为主的人文教育的重要价值,“没有什么东西比好的理论更为实际,没有什么东西比人文教育更为有用,大学里为本科生所开设的教学课程不包括职业教育,专门化必须晚一点开始……心智的训练使学生具有对社会的责任感”。

今天,对于大学通识教育的建设与发展是顺应时代的潮流,是逐步从拆解再次走向融合的过程。

“如今的知识积累不再是线性的,它具有跳跃性。”台湾大同大学副校长林永仁解释道,如今面对问题时,仅靠一个领域的知识往往难以解决,还需要其他各个领域的结合和帮助。

面对这样的情形和需求,台湾科技大学副校长庄荣辉经过多年研究甚至凝练出了一个新的概念——跨域。

“以北京理工大学为例,现在很多大学都在进行通识教育,而由匠师的过程,就需要不停地跨越。”他说,专业要“广要深,需要跨域;创新也需要跨域。”

要想成为一名好的律师,除了本专业知识外,你还需要心理学、人类学等的支持;研究设计一个人工智



2019 两岸高等教育(北京)高峰论坛现场

跨越通识教育的前世今生

——2019 两岸高等教育(北京)高峰论坛侧记

■本报记者 温才妃 见习记者 许悦

所谓通识教育就是通过对知识的融会贯通,具备“择其善而识之”的能力,使受教育者成为人格健全、视野开阔、和谐发展的完整之人。

能系统,你可能需要数学、计算机等多学科的辅助。

专业教育正在经历从拆解到融合的蜕变。

外来与本土

通识教育的风潮起源于西方。除了《耶鲁报告》外,哈佛大学的《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更是被后人奉为通识教育研究领域的圭臬,甚至被誉为现代大学通识教育的圣经。

它的诞生是在二战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经济发展迅速,大工业生产时代到来,教育也随之发生变化。对于知识扩展的需求,倒逼美国教育改革,调整课程的设置。就在大众争议究竟如何调整、如何改革时,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带

领十余位专家学者,指明了方向——自由社会需要通识教育。

最早刊发于1945年的这本红皮书中的许多思想,直到今天仍影响着世界诸多高校对于通识教育的布置、筹谋。

而根据扬州大学教授孙显军的考证,通识教育在我国的发展同样久远,尽管直至魏晋后期,通识两字才出现连用。

中国大学通识教育正式拉开帷幕是在1995年,当时通识教育还被称作文化素质教育。

“对于通识教育概念的定位和使用一直存在着多样的概念和丰富内涵。在我看来,所谓通识教育就是对通对知识的融会贯通,具备‘择其善而识之’的能力,使受教育者成为人格健全、视野开阔、和谐发展的完整之人。”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研究员庞海芍解释道。

在她看来,我们经常会混淆提及的另一个概念就是素质教育。素质是先天的禀赋和生理基础加上后天教育和环境影响,内化而成的稳定品质。更注重的是立德树人。

因此,通识教育和素质教育似乎不能混为一谈。

事实上,除了本土概念的混淆外,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对于专业和通识的认识,中西也存在显著差异。

“中国人对于‘专’很重视,而国外对于中国人评价为一般、普通的‘general’却十分重视。”黄坤锦分析道,翻看西方的词典,general一词前必注释便是基本的、根本的、必要的、必不可少的,足见其分量。中西对于“general”的认识差别造就了今天的

不同。在黄坤锦看来,专业教育不等于专门教育,专门教育加上通识教育才有资格被称作专业教育。

“人类最早的医师、牧师、律师专业在任何古典大学都有开设。但是医师不仅要学好医学知识,还要学习许多关于动物、植物、天文等的知识;神父则需要掌握世界各国的历史文化、发展史,掌握各种语言……可见,专门意味着还不够专业。通识和专门是势必要融合的。”

借鉴与发展

如今,大陆高校在通识教育上的发展仍停留在专业课加通识课的阶段,亟待突破瓶颈,进一步发展。

“21世纪是整合性学科的天下。传统跨领域教育在规划课程时,通常还是分开论,课程和课程组合,且多以本专业为主,不会考虑到其他专业的学生。”林永仁补充道,这就好比吃两道菜,是分开吃,还是在吃之前就将两道菜混合起来,得到的味道肯定不同。

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情形则大不相同,这所高校一个年级每年只招收400名学生。小巧的集体构成,使得学校在课程设计时,可以把设计观念串联进了每一门课程,以及所有的领域,以达到通识的效果。

而以传媒为特色的台湾世新大学同样如此。

“台湾私立大学都有自己的特色。发展小而精致、有特色的大学是我们的目标。世新大学以传媒专业见长,因此,学校要求大一学生不论是何专业都要学习媒体识辨课程,了解传播学的基本知识,能够辨别假新闻等,把传播的理念贯穿始终。”世新大学教授李功勤说。

除举办通识课程外,世新大学每学期都会举办多场讲座,邀请校友和大师分享人生历程和经验。“开设课程、邀请嘉宾做讲座所需的资金并不来自学校或政府,都是由校友捐课。校友可出资捐赠资助课程和讲座。”

除了通识课程的设置,在执行力度上,高雄医学大学则花了更多的力气。

据该校的教师介绍,作为一所专业性极强的医科高校,在还未实施通识教育前,校内通识课教师的生存环境极差,除了面对其他教师的藐视和质疑,甚至面临连独立的研究室都没有的窘境。“自从学校领导下了大工夫,狠心制定规则,将通识课学分,规定每个星期二下午1点~5点、星期三上午1点~5点作为博雅课程选修时段,不得排其他任何必修课程,改革效果很显著,通识课教师有了自己的办公室,通识教育也引起了全校师生的重视。”

可见,一项改革的成功与否,并不在于权力,而在于是否坚定果敢。

通识教育的改革进程还在路上,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相信今后更多的两岸高效互动会为通识教育带来更多生机。

不过,英语教育界人士回应学习英语的目的并不提以上三个目标,而是称为为了有效开展专业学习和工作。但是一个人英语基础再扎实,也是无法胜任专业学习和工作的,就如中文系学生汉语再好也无法胜任外交、医学、工程等领域的学习和工作。他们不仅需要专业知识,还必须懂得这些专业内容是如何通过英语建构和传播的。不结合特定领域开展英语教学,基础扎实的英语也毫无意义。

笔者以为,“厚基础、宽口径”是英语界最无知的说法。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学生的英语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但费时低效始终困扰着中国外语教学。这不是学生个人的失败,也不是英语教师的失败,而是我国外语教育学术定位的失败。

今天,中国的英语不再是典型的外语,在许多地方显示出强烈的二语特征。当许多大学生都在选修全英语专业课程,阅读专业的原版文献;当在“双一流”建设下,教师和学生都鼓励到国际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当企业对外投资、政府各部门对外交流日益发展时,我们还能说自己教的英语是外语,还能心安理得地坚持以应试和等级达标为驱动来学习英语或通识英语教学吗?

时代变了,中国人学习英语的目的变了,英语教学必须有颠覆性的范式变化。因此,高校不能再开展同质化通用英语教学,而应向专门用途英语教学,帮助学生用英语开展专业学习、科研和涉外工作;大学生不需要听说读写样样精通,而只需学习和专攻他们专业学习、科研和工作所需要的某种或某些语言技能;高校的英语教材不能再是大一统的,而应该因专业而异,以学生专业内容(专业相关普性和语类典型性)为载体,使其学习并掌握特定领域的语言构建和交流的规律;评估学生学习成功与否不应是全国统一的等级考试,而应该用什么考什么,就这么简单。

最近,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呼吁“中国的外语教学要来一场深刻的革命”。革命需要观念的转变,而转变观念需要突破利益障碍的勇气。英语不是用来打基础学习的,不是用来对付能力等级考试的,不是用来开展人文素质教育的。它是工具,用来学习世界上最新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知识,用来有效开展科技、经济和科研国际交流,用来讲好中国和世界故事的工具。这才是中国人学习英语的目的。

(作者系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副所长)

中国人学习英语的目的是什么

■蔡基刚

再过几天时间,“2019 TESOL 中国大会”将在杭州举行。TESOL 是“Teaching English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的缩写,即“英语为其他语言的英语教学”。成立53年来, TESOL 已发展成一个全球性英语教学协会。这个即将举办的千人大会必须回答一个被社会不断拷问的问题:中国人学习英语是为了什么?

“英语为其他语言的英语教学”可分为两类:英语为外语教学和英语为二语教学。两者区别是,前者仅把英语作为本体学习和研究,并没有语言应用目标(唯一应用是应试),是通用英语教学性质;后者则是学习者可在社会使用的语言,是专门用途英语性质。

70年来,英语在中国始终被当作外语在教,其标志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教学定位。无论是中小学还是高校,都把帮助学生打下扎实语言基础作为教学主要目标:通过课程考试和等级考试,获得学位所规定的外语学分。利用等级考试等,引导学生逐级攀升,最后达到或接近英语本族人水平。

第二,教学内容。各学段课程内容和教学设计是封闭式的,即以能力等级量表中对应的听说读写译等语言要求来设计,并以此制定评估标准和考核要求,而非以满足社会和学生英语能力需求为驱动。因此,教学内容以语法词汇学习和单纯听说读写技能训练为主,课堂内外组织口语演讲或写作比赛也是以语言技能为主要目的和评判标准。

第三,教学应用。语言使用除应对课程考试或升学考试外,中国的外语教学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就是通识英语,即发现英语可以开展人文教育或树人教育,通过多样的文化主题和文学作品,拓宽学生国际视野,促进其心智发展,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据统计,中国跨有三亿多人在学英语,仅在大学、小学学习英语的人数就达一亿以上。全国人大代表李光宇曾统计,一个孩子10年里,有将近五分之一(18.13%)的时间花在学习英语上,学生一年的英语必修课要消耗掉16378亿元,中国人每年学英语消耗掉的钱至少能投资0.8个三峡、发射204个神舟航天飞机。而这一数据仅涵盖小学三年级到高三,如果再加上大学和越来越多小孩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学习英语,那么至少要学14年。

倘若学习英语仅仅是为了达到以上三个目标,那么笔者认为,李光宇提出的取消高考英语科目、把中小学英语必修课改为选修课,完全合理合理。

不过,英语教育界人士回应学习英语的目的并不提以上三个目标,而是称为为了有效开展专业学习和工作。但是一个人英语基础再扎实,也是无法胜任专业学习和工作的,就如中文系学生汉语再好也无法胜任外交、医学、工程等领域的学习和工作。他们不仅需要专业知识,还必须懂得这些专业内容是如何通过英语建构和传播的。不结合特定领域开展英语教学,基础扎实的英语也毫无意义。

笔者以为,“厚基础、宽口径”是英语界最无知的说法。

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学生的英语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但费时低效始终困扰着中国外语教学。这不是学生个人的失败,也不是英语教师的失败,而是我国外语教育学术定位的失败。

今天,中国的英语不再是典型的外语,在许多地方显示出强烈的二语特征。当许多大学生都在选修全英语专业课程,阅读专业的原版文献;当在“双一流”建设下,教师和学生都鼓励到国际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当企业对外投资、政府各部门对外交流日益发展时,我们还能说自己教的英语是外语,还能心安理得地坚持以应试和等级达标为驱动来学习英语或通识英语教学吗?

时代变了,中国人学习英语的目的变了,英语教学必须有颠覆性的范式变化。因此,高校不能再开展同质化通用英语教学,而应向专门用途英语教学,帮助学生用英语开展专业学习、科研和涉外工作;大学生不需要听说读写样样精通,而只需学习和专攻他们专业学习、科研和工作所需要的某种或某些语言技能;高校的英语教材不能再是大一统的,而应该因专业而异,以学生专业内容(专业相关普性和语类典型性)为载体,使其学习并掌握特定领域的语言构建和交流的规律;评估学生学习成功与否不应是全国统一的等级考试,而应该用什么考什么,就这么简单。

最近,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呼吁“中国的外语教学要来一场深刻的革命”。革命需要观念的转变,而转变观念需要突破利益障碍的勇气。

英语不是用来打基础学习的,不是用来对付能力等级考试的,不是用来开展人文素质教育的。它是工具,用来学习世界上最新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知识,用来有效开展科技、经济和科研国际交流,用来讲好中国和世界故事的工具。这才是中国人学习英语的目的。

(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上海高校大学英语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

来华留学生教育为何难以实现管理趋同化

■张瑞端

需要通过“申请—考核”就可以获得入学机会,其中部分留学生还能够获得较高额度的政府奖学金。

实际上,这种“申请—考核”的过程并非很多人想象的那么简单。发达国家一般都有较成熟的高等教育体系,家庭总收入水平也较高,最优秀的生源往往都会选择到国际上最顶尖的大学就读,来华留学生生源质量参差不齐。而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一般也相对落后,很多最优秀的生源会将中国的一流大学作为自己的重要选择,比如在柬埔寨、老挝等国家,一般都是能够进入该国顶尖国立大学的学生才能申请到中国政府奖学金,相当于北清复交的生源质量。

笔者在中国几所名牌大学做过留学生招生流程的调查,各校都建立了非常严格的招生录取规范和流程。少数高校历史上没有开展过留学生教育,处于工作的起步阶段,招生录取流程还不清晰,出现了一些把关不严的问题,也都在积极反馈和改进当中。

第三,同样是由于语言和国民教育体系的差异,在教学管理和毕业要求上难以实现中外学生完全一致。由于英语是全球通用语言,按照国际贸易标准就应当使用英语或以英语为主作为国际教学语言。例如在荷兰、比利时,大学对全体学生普遍使用国际通用的全英文教学,最终本土学生可以选择使用荷兰语写作论文,留学生则使用英语写作论文。但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国际化程度还相对滞后,仍然以我国的官方语言——中文作为高等教育的教学语言,而中文的学习难度又是首屈一指的,所以在课程考核、论文写作等环节,留学生会面临比较大的困难。校方和教师在教学管理

中从实际出发,适当放宽要求也是人性化的措施。但这种适当放宽要求并不是有些社会舆论所反映的毕业要求“形同虚设”。例如,留学生的毕业论文也需要跟本国学生一样送外审,而且外审过程中评阅专家并不知道所评阅的论文作者是留学生的,大部分留学生也能取得不错的成绩。此外,笔者认为,那90%的自费留学生是真心白银来华留学的,也不允许中国高校让他们在华虚度光阴。

第四,本国学生和留学生的奖助学金体系不同,中外学生都存在不公平感。我国高校的学生学业奖助学金主体是人民奖学金,针对本国学生发放,只有少量高校自设奖学金和社会捐赠奖助学金面向留学生群体,导致学业表现优异的留学生难以平等地获得学业奖励。不少人认为,留学生已经拿到中国政府奖学金了,自然不能再给他们发放这类性质的奖学金。但自费留学生群体占了接近90%的比例,也有一些优秀的留学生能够使用中文在班里做到学业表现名列前茅,他们却只能在数量极少的学校自设奖助学金和社会捐赠奖助学金当中进行激烈的竞争。

在笔者2018年所开展的留学生调研中,几位留学生对此提出了意见,希望能够在这方面获得同等待遇。留学生的资助标准为本科生5.92万~6.62万元、硕士生7.02万~7.92万元,博士生8.78万~9.98万元,单纯从数额看,本国学生和家长的确实容易不平衡。但这部分费用的主体部分用于缴纳3万元左右/年的学费和1.5万元左右的住宿费,余下的才是生活费。不要忘记,其他国家地区也为中国学生提供奖学金,很多奖学金数量非常可观。此外,由于

政策限制,来华留学生还不能像中国学生出国留学那样兼职、打工赚取生活费,也不能像中国的贫困生那样享受免学费住宿费及助学金等优待,家境一般的留学生在华的留学生活并不宽裕。

第五,在住宿方面,我国公办高校为全体本国学生提供普惠性、保障性的廉价住宿服务,留学生则不能享受这种廉价住宿服务。本国学生每年只需要缴纳1000多元住宿费,也正是由于这种住宿服务的普惠性和保障性,本国学生的住宿条件一直都不理想。有些高校学生还居住在8人一间的集体宿舍里面。即便是普通学生公寓的住宿条件也无法跟留学生公寓相比,因此饱受留学生和家长的批评。但需要注意的是,留学生公寓条件相对较好,是因为其属于准商业性的留学生公寓住宿服务,每个月需要缴纳1000~3000元不等的住宿费。很多家庭经济状况不太理想的留学生感觉难以承受,向学校申请进入中国学生的保障性宿舍住宿,却无法获得批准,只有个别高校启动了试点。

第六,在学生管理方面,留学生的学生管理和服务一般为为数不多的留学生管理办公室人员负责,而本国学生管理和服务则由系统、完善的学生工作体系覆盖。我国的高校辅导员、班主任工作是一种主动性的学生管理和服务,不仅在学生思想和生活上关心学生,也积极参与学生学业指导。

在不少学校,当学生出现学习困难的时候,辅导员、班主任会通过学校的学生学习预警体系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主动干预。留学生群体则往往游离在这个体系之外,为数不多的留学生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已经在日常的留学生

管理问题上疲于奔命,只能将留学生学习问题推给专业院系,但由于管理体系、工作职责和边界分属不同的部门,辅导员、班主任群体一般仅对本国学生负责,只能在班级活动的时候兼顾留学生,这就使得留学生群体很难获得本国学生那样全方位的学生管理和服务。也因此,很多高校的留学生管理办公室多年来一直呼吁趋同化管理,呼吁全校所有的职能部门和院系都将留学生工作纳入自己的责任范围。

中国属于这个开放世界的一部分,已经建立起了在校大学生总人数3800多万的高等教育体系,留学生规模刚刚接近50万人,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留学生教育已经成为推动我国教育国际化、传播和弘扬中华文化、提升中国软实力的重要途径。无论将高等教育作为面向各国留学生的服务贸易,还是作为知华、友华、爱华的国际交往战略组成部分,我们都需要不断完善留学生管理政策,加大留学生工作的经费投入,优化来华留学生的学习环境。